

# 全國與本土：廣東在地軍訓教育的創建與普及 (1932—1936)

王志偉\* 夏泉\*\*

**摘要** “軍訓教育”，是國民政府時期在國民黨、政府倡議下，訓練總監部和大學院（後為教育部）主導下，各省縣（市）教育部門參與下，在各省縣（市）學校中對在讀適齡青少年進行“童子軍”或“軍事教育”的一種課外課程。1932年之前，廣東軍訓教育在全國軍訓教育系統中的地位逐步由“中心”走向“邊緣”。被邊緣化的粵省軍訓教育不斷自我調整，藉以達到歸屬和靠攏中央軍訓組織系統的目的。1932年，陳濟棠上台，廣東軍訓教育進入本土化階段，“本土”的目的是實現粵省軍訓教育“獨立化”，具體措施是“四步走”戰略。廣東軍訓教育本土化並非“事出偶然”，它是教育順應政治、政治人物干涉教育，以及央地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

**關鍵詞** 廣東；軍訓教育；在地；本土化

目前，學界從教育、教育史或教育體系的視角對廣東軍訓教育進行整體系統性研究的成果仍不多見，在既有的學術研究中，“關涉性”論著佔比較大，對軍國民教育思潮、軍訓教育組織形式（童子軍）、軍訓教育與其他史事之間關涉聯繫，以及近代體育教育等的考察，是當前學界研究的主要路徑和取向。<sup>1</sup> 本文聚焦1932年至1936年廣東軍訓教育本土化問題，通過對本土化措施及過程的考察，既可以凸顯粵省軍訓教育所獨具的“廣東特色”，加深理解廣東與南京政爭下該省軍訓教育發展概況及特徵，還有助於發掘廣東軍訓教育在教育、教育史和教育學史等多層次上的意義和作用。

## 一、軍訓教育內容 及廣東與全國軍訓教育的關係（1932年之前）

軍訓教育，<sup>2</sup> 是軍事訓練教育的簡稱，是在

\* 王志偉，廣東技術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暨南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博士。

\*\* 夏泉，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適齡青少年群體中間開展的以軍事訓練為主、政治教育為輔的一門課外課程。<sup>3</sup> 童子軍是軍訓教育的濫觴，完整系統的軍事教育正式創立於1928年，<sup>4</sup> 之後該教育逐步被納入青少年在校必修科目。<sup>5</sup> 軍訓教育是一套具有完整建制的教育系統，具體地說，它由“一體兩翼一補充”構成。“一體”，即主體，是指要對在校適齡青少年開展完整意義的軍事訓練。“兩翼”，是指“對初中以下學生開展童子軍教育”<sup>6</sup> 和“對高中及以上學校學生開展軍事教育”<sup>7</sup>，在校女生不接受軍事教育，<sup>8</sup> 但是需要接受看護訓練，“查部定中等學校課程，初中男女生均以童子軍為必修科，高中男生授以軍事教育，女子授以看護訓練，三者科目雖不相同，而於青年訓練實屬同等重要地位”<sup>9</sup>。“一補充”，是指在不能或沒有條件開展軍事訓練的學校開展體育訓練。<sup>10</sup> “童子軍”和“軍事教育”是彼此獨立存在的教育類型，童子軍課程分政治教育、軍事訓練和技能訓練，軍事教育課程主要分政治講話和軍事訓練，在具體軍訓階段會重視軍風紀的養成和考核，就兩者訓練內容及目的來看，童子軍是軍事教育的準備階段，換言之，童子軍雖然也具有軍事訓練科目，但是，其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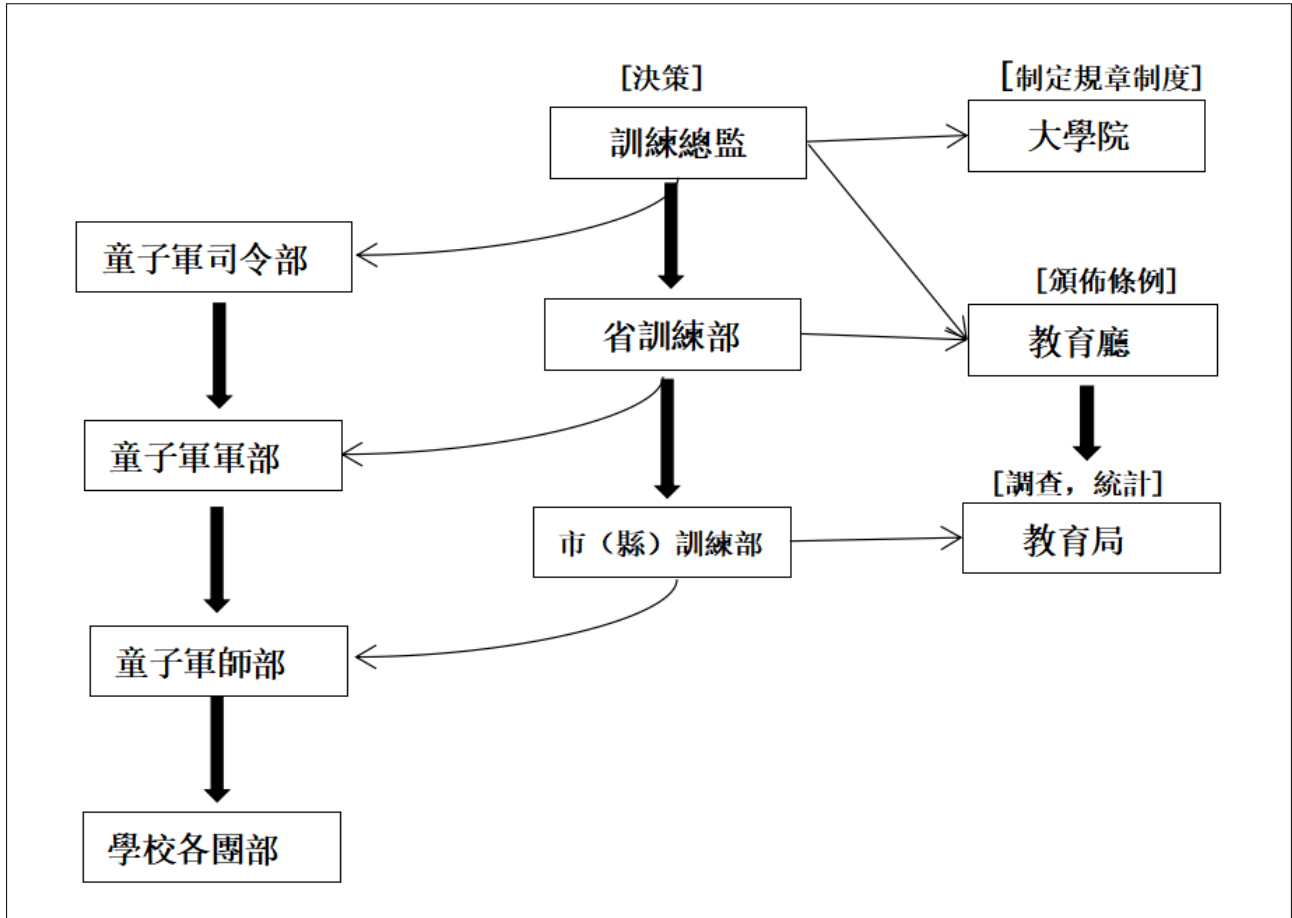


圖 1. 1928 年及之後軍訓教育管理組織體系圖（圖片來源：作者繪製）

練目的主要還是在於軍事精神涵養的培養和保持，“初中之軍訓（指童子軍教育），應以注意精神教育及體育，並涵養其紀律觀念，以為接受高中軍訓之準備”<sup>11</sup>。軍訓教育實行分級升級制和男女分別教育。<sup>12</sup>軍事教育階段，軍訓成績直接和畢業、升學、工作掛鉤，“軍訓學期成績不及格者，不得升級或畢業”<sup>13</sup>。

與中國傳統德育教育不同，軍訓教育更多地注重青少年軍事知識的增加、身體素質的提升，以及生存技能的培訓。軍訓教育創設初衷、課程設置及訓練手段決定了軍訓教育必然具有多種特性，總體而言，主要有四種：（1）它是一種武育教育。軍訓教育以軍事訓練為主，政治教導為輔，“融合而成文武合一，術德兼

修”<sup>14</sup>，注重青少年軍事技能和生存技能的訓練和培養。（2）它是一種課外教育，“蓋其可補學校教育之不逮”<sup>15</sup>。所謂“課外”具有兩種含義：授課時間上講，不佔用課堂時間；授課場所上說，以戶外術科訓練為主。（3）它是一種國防教育。國防教育被落實於每日具體軍事訓練之中，國防教育精神被植入軍訓教育全過程，並非落實於口頭宣傳之上。<sup>16</sup>（4）它還是一種公民教育。軍事訓練注重培養青少年守時、守紀的品質及初步具有政治生活常識、國防意識，其目的主要是為了造就社會新公民。<sup>17</sup>

軍訓教育系統初步成形於 1928 年，是由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提案，<sup>18</sup>經國民黨執行委員會會議決策，後交由訓練總監部、大學院（後

## 粵澳人文

為教育部）、童子軍司令部和軍事委員會等具體籌辦。該教育系統的形成是一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雙結合的教育創新。所謂“自下而上”，是指從軍訓教育體系創設看，童子軍教育是軍訓教育的“濫觴”，<sup>19</sup>它最初由民間引進和推廣，1926年之後，國民黨看到了學生軍事訓練所蘊含的價值和意義，故而，才會有將童子軍教育管控權收歸中央的舉措出台，“青年部直接統轄國民政府域內之童子軍，而與全國童子軍相聯絡”<sup>20</sup>，以及1928年軍事教育的創設。<sup>21</sup>從軍訓教育創設推動力量看，社會各界熱烈呼籲，是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下決心創設該教育的動力源頭。至於“自上而下”，是說1928年軍訓教育完整體系的建構是從中央開始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是領導機構，訓練總監部、教育部、童子軍司令部和軍事委員會是具體承辦機構，它們初步設計和規劃了軍訓教育的課程、進度、訓練方法及考核方式。

按照國民黨中央最初規劃，新創設的軍訓教育的管理體制將是一種集權制的組織形式，換言之，軍訓教育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各省遵照中央部署和計劃，創設或調整本省的軍訓教育，最終形成“一綱眾目”式的軍訓教育組織體系，藉以達到指揮上“以指使臂”的目的，“方足以收指臂之效”<sup>22</sup>。為了保障中央對軍訓教育的管控，國民黨中央出台了兩大措施：

（1）創立組織領導系統；軍訓教育管理體系是一種三元共治的領導系統（見圖1），它由訓練部系、教育廳／局系和軍訓系三元構成。國民黨在中央設立訓練總監部、各省縣（市）黨部設訓練部，作為同級別軍訓教育的領導機關；<sup>23</sup>教育廳／局負責領導、組織和協調各級學校軍事訓練事宜，教育部／廳／局與同級訓練部協同工作，“函請”是常見合作方式，教育系按照訓練系的決策開展制定、頒佈、調查及統計工作，“函教育廳、教育局、中大學校將人數趕緊報匯以備實施”<sup>24</sup>。中央設立軍訓教育軍系總部（童子軍是童子軍總司令部，<sup>25</sup>軍事教育是軍事委員會），自中央至各學校軍團部，<sup>26</sup>在形式上，形成一套帶有完整意義的軍系組織管理系統。（2）強令規定各省負責具體軍訓

的教官要由中央選派。軍事教官具體負責各校學生軍訓事宜，管控着教官選派及管理權，就能從根本上將全國各省軍事教育管理權收繳中央。<sup>27</sup>

1932年之前，廣東軍訓教育一直是全國軍訓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粵省自覺接受中央領導且按照中央軍訓教育規劃重新整頓粵省軍訓教育，從管理組織體系而言，1926年廣東便組建本省童子軍軍部籌備委員會，1928年便着手組建“高中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sup>28</sup>；從軍訓教育課程上看，無論是童子軍訓練，還是軍事教育，這一時期課程主要是以中央規劃為圭臬，重新更正或補充軍訓教育課程內容；從軍訓教育組織管理上說，中央指令得到了貫徹和執行，令行禁止是這一時期重要特徵。

1932年之前，廣東軍事教育歸屬中央管理，是總體特徵，就該省軍訓教育創設和整改的具體細節而言，廣東與中央還存在一些特殊關係，這裡所說的“特殊”主要有以下三點內容：（1）國民黨收繳軍訓教育管控權是在廣東首先進行的。1926年，當時定都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將童子軍管理權收歸中央，此舉是中央收繳軍訓教育管控權的開始。（2）在1926年末國民政府被遷之前，廣東一直被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視作軍訓教育的示範省和試驗省，國府、省府和市府三府同處廣州一地時，國府管控的軍訓教育實際上就是廣東省軍訓教育。國府北遷後，特別是定都南京之後，江蘇、浙江等地成為軍訓教育的“中心”，“現由訓練總監部根據方案籌劃，先從首都及蘇浙皖贛各省高中以上學校着手辦理，然後漸次推行，以期普及全國”<sup>29</sup>，廣東因遠離中央，粵省軍訓教育逐步被邊緣化。（3）廣東軍訓教育的創設是兩種模式的結合，即“本省自創”和“接受中央指令，創設粵省軍訓教育”。“本省自創”是指1928年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召開之前廣東已經有軍訓教育的創設，主要有兩種模式：廣州學生聯合會領導下組建的成系統的軍事訓練；<sup>30</sup>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和陸安師範學院等大中專院校自主創辦的

本校軍事訓練。<sup>31</sup>“接受中央指令，創設粵省軍訓教育”，主要是指1928年至1932年，廣東全省範圍內軍訓教育的創設和普及，這一時段，粵省軍訓教育創設主要包括兩個層面：對未設軍事訓練教育的“新創”和對既設軍事訓練教育的“改造”，這些措施的最終目標是建立接受中央領導下的廣東統一軍訓教育。

故而，不難看出，1926年國府北遷之前，廣東軍訓教育一直處在全國軍訓教育的“中心”；1926年至1932年，是廣東軍訓教育逐步被“邊緣化”的時期，同時，也是廣東軍訓教育通過自身不斷地整頓或創設藉以歸屬中央軍訓教育系統的重要階段。<sup>32</sup>

## 二、廣東軍訓教育走向本土化的措施（1932—1936）

1932年，廣東省軍訓教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即進入到了教育“本土化”的時期。粵省軍訓教育之所以於此時進入新時期，與廣東政局變動有很大的關係，隨着陳銘樞政治失敗且被逐出粵省，廣東進入到了陳濟棠時代，“陳濟棠代之而興”<sup>33</sup>。一心與蔣介石爭鋒的陳濟棠自然將廣東視作本家的“自留地”，排斥或阻礙中央對廣東的滲透是陳氏一貫的主張，“矧陳氏當時權傾南天，個人意旨，有如帝皇時代之綸音，不容偶加反對”<sup>34</sup>。其中，就包括廣東軍事教育問題。

1932年之後，廣東省教育廳秉持陳濟棠懿旨，再次對粵省軍訓教育進行了重新整頓（包括童子軍和軍事教育兩方面），這樣做的直接目的是為保持廣東軍事教育的獨立性，核心思想是為排斥中央對粵省教育的滲透和干預。措施主要從統計調查、思想教育、組織機構、教官委派等四個方面着手，具體而言，則是：重新統計粵省學校及學生情況；<sup>35</sup>重制學校軍事訓練教育大綱及軍事訓練進度表；<sup>36</sup>編制新的訓育教材，開展讀經和效忠教育；廢除中等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sup>37</sup>重新組織粵省軍訓主管機關，後又在省教育廳設第五科專管軍事

教育；排斥國民黨中央訓練總監部遴選和選派軍事教官，取締學校自聘軍事教官做法，統一由上級委派；<sup>38</sup>在粵省創辦軍事政治院校，派遣粵籍軍人分赴各校當任軍事教官，組織全省軍事教官組織網。為貫徹落實保持廣東軍事教育獨立性的各項具體措施，廣東省教育廳做出了“四步走”的規劃：

第一步，收回軍事教官任免權。軍事教官由誰委任，聽誰指揮，對誰負責，是關乎軍事教育主導權由誰掌握的重大問題，按照國民黨中央早期預期，軍事教官是要由軍事委員會（後為訓練總監部）遴選，然後由大學院（後為教育部）統一分別委任的，所以如此，是國民黨中央意圖掌控全國軍事教育的管控權，是中央滲透地方的一種隱性方式和措施。控制住學生，既能把控住“人才”資源，還可以建立起“國”與“家”之間的斷續聯繫（學生成了連結紐帶），同時，還為中央權勢滲透地方提供助益，對於中央這些的意圖，各省縣（市）長官應該是“洞若觀火”，在國民黨中央直接管控的地區，比如江浙，因為無法抗拒中央，只得在貫徹執行中需求“機動”。而在半獨立地區，如兩廣，中央滲透的力度、深度及廣度都會“大打折扣”，兩廣地區長官可以以各種藉口阻止中央對地方的滲透，1932年陳濟棠治下的廣東便是如此。1932年初，廣東教育廳就下達訓令，將軍事教官的遴選和委派權收歸粵省的中等以上學校軍訓委員會（簡稱“軍訓委員會”），令曰：

現准中等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第二五號公函內開：“查各校學生軍事訓練，最貴指揮統一，同時對於教官人選，亦應妥為考慮，方足以收指臂之效。現經本會考試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議決，所有各校軍事教官，一律由本會統一委任在案，相應函達貴廳查照，轉行知照為荷”等由，准此，除分行外，仰該校即便知照！<sup>39</sup>

廣東教育廳收歸軍事教官任免權，這就直接割斷了中央對地方滲透的“渠道”，同時，

## 粵澳人文

也為消除粵省軍事教育各自為政打下了基礎。

第二步，從組織改革入手，斷絕中央和地方聯繫“紐帶”。如果說收歸軍事教官任免權，是從“人”的層面隔斷中央滲透，那麼，取締“軍訓委員會”，就是從“組織（物）”的層面消除中央對地方的滲透。1932年，在西南政務委員會的主持下（陳濟棠把持和主導了該委員會），首先取締了“中等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sup>40</sup>將其職權分化給廣東省教育廳、廣州市教育局和中山大學三大機構，職權“一分為三”，在分化事權之中實現集權的目的。繼而，在廣東省教育廳下設第五科，<sup>41</sup>具體主管廣東軍事教育，主要職責大致可以分作三種：（1）規劃本省軍事教育，制定軍事教育進度表；（2）選派軍事教官負責軍事教官的“回鍋”再教育（具體是指對軍事教官進行知識與技能再培訓），目的是為了整齊劃一本省軍訓教育；<sup>42</sup>（3）召開會議，佈置或安排本省軍事教育相關事宜，會議期間，軍事主任教官（有時包括軍事教官）與校務必須參加。<sup>43</sup>

第三步，調查省縣（市）學校情況，選派軍事教官赴各學校擔任軍事教官，形成了廣東省軍事教育軍官組織網。調查省縣（市）學校情況是為選派軍事教官做準備，<sup>44</sup>只有全面掌握了本省對軍事教官的需求，才能更好地選拔和任用。廣東本土軍訓教育的教官主要來源於廣東軍事政治學校，該學校由陳濟棠創辦且親任校長，士兵到校輪訓畢業後，經考試遴選後被派赴各校擔任主任教官或軍事教官，<sup>45</sup>至1932年秋，廣東全省軍事教官組織關係網完全編制完成。<sup>46</sup>

第四步，編選新的訓練教材，特別是訓育教科書，在青少年中間廣泛和普及開展讀經運動與效忠教育。管控人才，最首要的是要從思想上對其予以控制，具有認同、認可及效忠意識的人才必然會歸管控者麾下效力。陳濟棠上台後，加緊制定各項軍事訓練計劃，<sup>47</sup>編印訓育教材，開展讀經運動，<sup>48</sup>及利用軍事教官在受訓學生中間開展效忠意識的培養，<sup>49</sup>種種措

施，都是以效忠陳氏為終極指歸的。

廣東本土軍訓教育，它的訓練科目、方法和考核方式與中央規定並沒有太多差距，它的所謂“本土”更多地是傾向於建立粵省獨立軍訓教育體系，換言之，即是粵省在地政要意圖把控住本省軍訓教育主導權，這裡包括兩個層面：（1）在央地關係層面，處於下級的粵省希望抵觸、消除中央通過教育對廣東的滲透，以謀求廣東教育獨立為目標，反對粵省教育成為中央教育的分支或附屬。（2）在粵省本土境內，意圖建立自上而下的教學管理組織系統，將構建廣東教育上指下行的“以指使臂”式的行政管理組織關係作為追求目標。為保障目標實現，粵省有組織、有系統和有計劃地組建和編織了本省軍事教官和童子軍教練組織關係網。“四步走”戰略是以實現廣東軍訓教育本土化（這一過程伴隨着排斥國民黨中央對粵省的介入和滲透）為根本目標，該戰略的出台，是以廣東軍政權基於在地利益以及陳濟棠想要積蓄自家力量為出發點，所以，才會有積極推動軍訓教育本土化（即廣東化）的具體舉措。不難看出，四步走戰略實現的時段，也是廣東本土軍訓教育成型的時期。

自1932年始，有廣東特色的軍事教育正式普及起來。軍事教育的“廣東特色”主要指四個方面：（1）廣東省軍事教育實現了半獨立性（甚至是獨立性）發展。1932年之後的較長時間內，廣東軍事教育開始以廣東本土制定的軍訓教育大綱為指導，是在帶有一定封閉性特徵的背景下逐步發展壯大的。（2）廣東軍事教育建制完整，體系完善，軍事教官組織成建制，廣東省一縣（市）軍事教育系統較為完整地建立起來。（3）“學—軍訓—軍”良性互動模式較早在廣東省確立，“學”是指學生，“軍”是指軍官，學生通過軍訓，成績優異者可以直接被選派為粵軍下級軍官，“使學生受訓期滿畢業後，能充當國民兵團下級幹部或任部隊初級軍官”<sup>50</sup>，“高中學生軍訓能任軍士，大學生軍訓能任官長”<sup>51</sup>，這一模式的形成，與陳濟棠身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西南政務委員會委

員長以及廣東省黨部最高首腦不無關係，黨、政、軍三權集於一身，這種權力架構給了陳濟棠從學生中間選拔初級軍官的“便利”權力。

(4) 廣東軍事教育一直走在全國前列，而且較早創制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系統，在軍事教育實施的深度、廣度與高度上均為一時楷模。

1932年之後，廣東軍事教育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具體表現為：(1) 1932年至1937年，廣東軍事教育在全省全面鋪開，<sup>52</sup>各校責任到人，有案可稽。1932年，嶺南大學發佈公告嚴格貫徹開展軍事教育的指令，“為佈告事，案查中等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議決自高中一年級起大學止，無論從前已否受過軍事訓練，現在均需從新再行嚴格實施。但女生得免受訓練，所有各校軍事訓練時間每星期定為學科四小時，術科八小時，共十二小時，軍事訓練主任及學術教官助教均由該會分別委聘，以歸統一而專責成一案，本校自應查照辦理”<sup>53</sup>。

(2) 軍事教育學校覆蓋面擴大，1932年之前，軍事教育主要在高中及大學內開展，1932年之後，軍事教育主要在四類學校層次內開展，主要包括高中、專門學校、師範及職業學校。<sup>54</sup>按照中等以上學校軍訓委員會早期規劃，廣東省內初中學校也要開展軍事教育，“前定於二十一年度上學期起，廣州市內初中以上各學校一律施行軍事訓練”<sup>55</sup>，只不過受制於經費，所以，最終沒有開展起來。<sup>56</sup>(3) 軍事教育建制逐步完備，人員、物資等幾乎全部到位。到位方式有：上級發給<sup>57</sup>、學校自購<sup>58</sup>和學生自備<sup>59</sup>三種方式相結合。

### 三、廣東軍訓教育本土化的背後蘊藉

民國時期，教育順應政治而存在，廣東政治半獨立性特徵規定和要求該省教育也需要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廣東處於並且長期處於“半獨立”狀態，這種政治特徵決定了粵省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很難不受干擾，走向“獨立”或“半獨立”是粵省教育發展趨勢之一。在國民黨建立全國性質政權的階段及其之後，廣東政治半獨立狀態也在一直持續，直到1936年兩廣事

變結束後，廣東半獨立狀態才最終消失。1932年之前，粵省軍訓教育一邊被逐漸“邊緣化”，另一邊卻又不斷向中央軍訓教育體系靠攏和歸屬，這種特殊現象的出現，與當時廣東陳濟棠和陳銘樞兩人政治紛爭難止不無關係。在二陳“雙峰並峙”的時期（陳銘樞多處於守勢，陳濟棠多為攻勢），如何打破政治平衡，取得廣東統治權是二陳都要考慮的問題。在粵省政治勢力相對平衡的情況下，誰能獲得中央支持，是其能夠“脫穎而出”的重要保障。二陳均討好於中央的時況，二陳“雙峰並峙”的政治格局，決定了粵省教育無法為某一個人或某特定政治團體服務，那麼，粵省軍訓教育歸屬中央軍訓教育系統，既是“題中之義”，也是必然趨勢。1932年，陳銘樞在與陳濟棠政鬥中以落敗出局，陳濟棠在粵省“定於一尊”的政治生態出現，“廣東封建領主陳濟棠氏，自京粵和平會議後，傲如一方，儼然為一土皇帝，與中央若即若離”<sup>60</sup>，如何保持權勢及維持廣東半獨立狀態，是成為南天王的陳濟棠考慮的重心所在，軍訓教育全國“一體化”明顯損害了廣東政治半獨立性，為了抵消這種損害，謀求廣東軍訓教育本土化就成了必然趨勢。

政治人物干預教育，是廣東軍訓教育“本土化”迅速開展的重要動力。1932年，陳濟棠公佈三年建設計劃，同一時期，粵省軍訓教育本土化也被提上議事日程。軍訓教育是與軍事相關的一種特殊教育，<sup>61</sup>參訓學生除了接受軍事知識、培養軍事技能，更重要的是學生需要參加射擊訓練和野外演習，這種教育特殊性，<sup>62</sup>註定必然引起軍人出身的陳濟棠的關注。陳氏意識到了軍訓教育對改變粵省傳統或舊有教育的弊端所能發揮的重要作用，是陳氏試圖在同一系統之內完善教育制度和消除教育弊端的一種解決問題思路。陳氏關注和推動粵省本土軍訓教育改革，連學生軍訓服裝的改進都要參與，<sup>63</sup>是該教育迅速開展的動力之一和重要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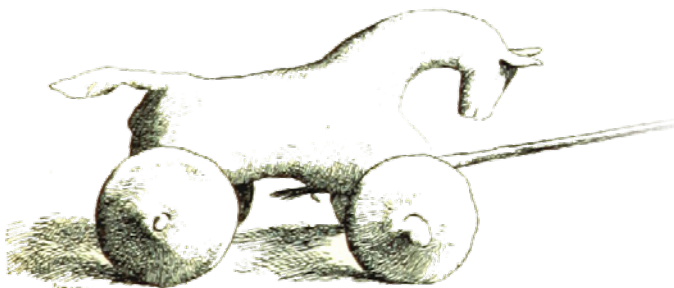
廣東軍訓教育本土化，是央地矛盾——滲透與反滲透鬥爭的必然結果。國民政府獲取了全國政權之後，逐步加強了對教育系統的管制，<sup>64</sup>

## 粵澳人文

中央也試圖通過軍訓教育實現對地方教育系統的滲透。復興社具體負責該項工作實施，它在學生群體中間積極發展對象，並灌輸“一個黨，一個領袖的精神，要在全國青年中養成‘敬愛領袖’的風氣，任何人一提到或者聽到‘委員長’，必須即刻起立致敬”<sup>65</sup>，成為中央甚至是蔣介石實現個人意圖的工具。廣東在地政要及陳濟棠對中央滲透策略洞若觀火，為了抵消中央滲透，唯一能夠採取的措施必然就是阻礙省軍訓教育和中央軍訓教育的聯繫和溝通，故而，建立本土化軍訓教育就成為央地矛盾的必然結果。

### 結語

廣東青少年軍訓教育創設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普及於三十年代，全民族抗戰時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壞，1949年隨着國民黨政權垮台，具有黨管色彩的軍訓教育正式走下了歷史舞台。軍訓教育是一種創新教育，與中國傳統德育教育不同，屬於武育教育，它以軍國民教育為指導思想，逐步成為在學青少年的必修課程，在長達十數年的時間裡，對於青少年軍事知識增加、政治素養提升和生存技能培養發揮過重要作用，特別是抗戰時期，部分童子軍和學生軍成為志願支援、服務或投入抗日前線的重要力量。廣東本土化軍事教育的出現，與粵省政治長期處於半獨立狀態有很大關係；政治人物干涉教育，是粵省軍訓教育走向本土化的重要推動力；省域教育折射央地政治上的紛爭，說明當時教育很難擺脫政治影響而獨立發展。



註釋：

1. 相關成果包括徐方平：《清末民初軍國民教育思想成因探析》，《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第93-98頁；孫玉芹、劉敬忠：《抗日戰爭時期童子軍社會服務活動述論》，《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3期，第66-76頁；邢其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近現代學校體育的影響》，《體育文化導刊》2005年第6期，第68-70頁；榮子涵：《廣東童子軍研究1915—1938》，碩士學位論文，暨南大學歷史系，2005年；饒林峰、吳禮劍：《近代我國學校體育思想的演變及其立論基礎》，《體育文化導刊》2015年第5期，第179-182頁；高曉峰、王華倬：《民國時期學校體育政策變遷研究（1912—1949）》，《中國學校體育》2018年第5卷第3期，第17-24頁。
2. 軍訓教育只在本國學生中開展，在專科以上學校就讀或留學的外籍學生不在軍訓之列，“除密令飭知各省市教育廳局及專科以上學校令達，對於在校外國學生凡平時軍訓及由學校量予免除，凡集中訓練並應不令參加”。見《廣東國民軍事訓練委員會關於免予外籍學生參加軍訓一事的訓令》，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2-438-053。
3. 私立廣州大學編：《私立廣州大學概覽》（國立台灣圖書館典藏，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NTL-9900015209F01），廣州：私立廣州大學，1937年，第25頁。
4. 《全國教育會議關於設立學生軍問題的決議》，中華民國大學院編纂：《全國教育會議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第459頁。
5. 《轉令飭於下學期開始時將軍事訓練時間編入正式功課》，《廣東省政府公報》1932年第196期，第110頁。
6. 《國立中山大學關於本校童子軍自下學年其劃交中小學辦理等情的便條》，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3-37-087（1）。
7. 鶴鳴：《由加緊軍事訓練談到征兵制》，《高農期刊》（創刊號），1931年，第238頁。
8. 《嶺南大學關於中等以上學校男學生一律接受軍訓的佈告》，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38，檔案號：038-002-99-029。
9. 《高中女生看護訓練應由政府統籌實施案》，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1-28-128~129。
10. 立法院編譯處編：《中華民國法規匯編》，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1934年，第97頁。
11. 《令發各縣高中以上學校軍事訓練主任教官服務概要》，《廣東省政府公報》1933年第234期，第59頁。
12. 以童子軍為例，因為性別和體力問題，主要分為男童子軍和

- 女童子軍。童子軍課程大致分為三級，即初級、中級和高級，三級是升級制，即完成了一個級別的訓練並取得成績證書後可升入下一級。就軍事教育而言，在高中、預科和大學三階段，按常理而言，一般均需要接受兩年軍事教育，前後合計共六年。部分學生不經預科直接升入大學，則正常接受大學軍事訓練，不再補預科階段的軍事教育。
13. 《嶺南大學關於各生須通過軍事訓練考試方得畢業或升級的函》，現存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 038，檔案號 038-002-61-043。
  14. 台灣“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台北：“國史館”，1996年，第188頁。
  15. 《廣州市擴充市校童子軍規劃》，廣州市國家檔案館藏，全宗號：資系，類別號：政類，目錄號：482。
  16. 彭武：《大學生為甚麼要受軍訓？》，《民大軍訓特刊》（訓練與管理）1937年，第37頁。
  17. 蔣中正：《“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4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演講”，第231頁。
  18. 《全國教育會議關於設立學生軍問題的決議》，中華民國大學院編纂：《全國教育會議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第459頁。
  19. 1928年之前，童子軍教育就是軍訓教育的“代名詞”，童子軍教育某種程度上就是當時的軍訓教育。
  20. 《國民黨童子軍委員會秘書處關於郵送童子軍月刊等事的文》，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3-37-066。
  21. 《國立中山大學關於童子軍撥歸中學辦理等情的函》，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3-37-082（2）。
  22. 《各學校軍訓主任不得逕自處斷及呈報校內各事項——廣東省政府教育廳訓令（第二六九八號）》，《廣東省政府公報》（第298期），1935年6月20日，第87頁。
  23. 《廣東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訓練部工作報告書》，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資系，類別號：黨團類，目錄號：65。
  24. 《中等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記錄》，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2-21-031~032。
  25. 《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關於如有童子軍問題可直接諮詢本部一事的啟事》，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3-37-020（1）。
  26. “高中設軍訓辦事處，專科以上學校設軍訓部”，見《關於呈送附中軍訓辦事處模擬一九三六年度人員編制及經費預算表等情的報告》，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3-54-091~094。
  27. 《教育部頒佈實施教育七項辦法》，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廣東省教育廳體衛處等：《廣東青少年軍體教育歷史資料（1919—1949）》，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91年，第284頁。
  28. 廣東省青少年軍事教育的“軍事訓練委員會”前後設有兩種，1928年至1932年1月，為“高中以上軍事訓練委員會”，1932年1月之後，被改組為“中等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見《中等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2-21-001~004。“高中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是“中等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的前身，後者是基於對前者的“繼承”和“改組”。之所以要將“高中以上學校”改為“中等以上學校”，主要原因在於1932年開始廣東省軍事教育不再僅僅針對高中及以上學校，部分初中學生也被吸納為軍事教育的適齡對象。標準是男生年滿18歲，“以達兵役之年齡為軍事訓練之年齡（十八歲）”。見《高中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記錄》，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2-21-024~026。
  29. 《施行國民軍事訓練——何應欽歡宴三全代表之演詞》，曾錫珪：《國防問題之討論》，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廣東省教育廳體衛處等：《廣東青少年軍體教育歷史資料（1919—1949）》，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91年，第264頁。
  30. 《市學聯會第八次執委會議紀——通過軍事訓練委員會組織大綱，聘定暑期學生軍救護隊員籌備員》，見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廣東省教育廳體衛處等：《廣東青少年軍體教育歷史資料（1919—1949）》，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91年，第147頁。
  31. 《中大訂定軍事訓練計劃》，見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廣東省教育廳體衛處等：《廣東青少年軍體教育歷史資料（1919—1949）》，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91年，第155頁。
  32. 1928年至1932年，是廣東軍訓教育自身整改和歸屬中央軍訓教育系統的重要階段。
  33. 《失意軍人陳濟棠》，歐陽宗：《中國內幕》（第3集），上海：新中國報社，1943年，第99頁。
  34. 《陳濟棠盛氣倡讀經》，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民國野史》（第九十八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40—141頁。



## 粵澳人文

35. 《本市省轄各校受軍訓學生人數調查》，《廣州市政府市政公報》1933年第418期，第101-102頁。
36. 《普及廣東省中等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實施方案》，《南海縣政季報》1932年第11—12期，第225-227頁。
37. 《令知裁撤中等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廣東省政府公報》1932年第200期，第78-81頁。
38. 《令復中上學校軍事訓練實施方案仰知照案》，《南海縣政季報》1932年第11—12期，第224頁。
39. 1932年，廣東省內各校軍事教官按規定一律開始由本省軍訓會委派，《令知各校軍事教官一律由軍訓會統一委派——廣東省教育廳訓令（第三〇〇號）》，見廣東省檔案館、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廣東省教育廳體衛處等：《廣東青少年軍體教育歷史資料（1919—1949）》，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91年，第328-329頁。
40. 《令知裁撤中等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職務由省教廳市教育局中山大學分別辦理》，《廣東省政府公報》（第200期），1932年9月30日，第78-81頁。
41. 《教廳呈報增設第五科管理實施軍事訓練事項》，《廣東省政府公報》1932年第203期，第20頁。
42. 《本廳第五科召集各校軍訓主任及學科教官會議》，《廣東教育廳旬刊》1935年第1卷第3期，第89-93頁。
43. 《轉飭各校務須出席軍訓會召集會議》，《廣東省政府公報》1932年第178期，第99頁。
44. 《廣東國民軍事訓練委員會關於助教馮寶璿免職遺缺何遠明接充的公函》，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3-56-126~127。
45. 《廣東軍事政治學校軍訓教官研究班關於將訓練期已滿的教官許頌平等人送回中山大學等情的公函及附件》，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3-55-091~093。
46. 《廣東省各縣市廿四年度高中以上學習軍事訓練部各級人員姓名一覽表》，《廣東教育廳旬刊》1936年第2卷，第5—6期，第89-101頁。
47. 《高中以上學校軍事訓練教育大綱》，廣東省政府秘書處編：《改訂廣東省單行法令匯編》，廣州：廣東省政府秘書處，1933年，第58-61頁。
48. 《陳頌孝經讀本》，《華安》1933年第2卷第1期，第2頁。
49. 《陳濟棠、蕭佛成提倡中小學讀經案的辦理經過——黃麟書在聯合紀念周報告摘錄（附抄廣東省中小學經訓實施辦法）》，見廣東省檔案館：《陳濟棠研究史料（1928—1936）》，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85年，第313-314頁。
50. 王毅誠：《學校軍事訓練問題》，《教與學》1940年第5卷第7期，第10頁。
51. 彭武：《大學生為甚麼要受軍訓？》，《民大軍訓特刊》（訓練與管理）1937年，第37頁。
52. 《廣東省政府關於埔縣府籌辦軍訓班情形的指令》，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04，檔案號：004-002-0117-109~110。
53. 《嶺南大學關於中等以上學校男學生一律接受軍訓的佈告》，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38，檔案號：038-002-99-029。
54. 《准軍訓會函以奉部令規定職業學生集訓事項請轉飭遵照等由仰遵照由》，《廣東教育廳旬刊》1937年第3卷第7期，第30頁。
55. 《高中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記錄》，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2-21-024~026。
56. 《轉令飭初中學生毋庸軍事訓練》，《廣東省政府公報》1932年第199期，第77-83頁。
57. 《教育局令市立各校領用軍訓步槍》，《廣州市政府市政公報》1933年第418期，第90頁。
58. 《市師請款購置物品擴充軍事訓練案》，《廣州市市政公報》1930年第369期，第64頁。
59. 《令准中上學校軍事訓練會請轉飭各縣市高中以上學生預繳四元以備購軍事書籍之用仰遵照案教字第一三三三號廿一年九月廿七日》，《南海縣政季報》1932年第11—12期，第268頁。
60. 《陳濟棠秘密槍斃莫秀英》，《當代史刺》，上海：上海周報社，1933年，第370頁。
61. 《高中以上學校軍事訓練學生應守規則》，廣東省政府秘書處編：《改訂廣東省單行法令匯編》（續編），廣州：廣東省政府秘書處，1934年，第60-64頁。
62. 《高中學生應完全實施軍隊管理方法以期完成軍國民教育之主旨案》，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20，檔案號：020-001-28-124~125。
63. 《廣東省政府關於抄發擬定廣東黨政公務人員暨各級學生平時及軍訓制服原提案的訓令及附件》，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006，檔案號：006-009-0007-010~013。
64. 許紹衡：《廣雅中學的片段回憶》，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市荔灣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35輯），廣州：廣東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5頁。
6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集》（第11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15頁。



*Adrian van der Meulen 1821*